

RU HE DANG

GE HAO BA BA

如何当个好爸爸

〔美〕汤姆·布莱顿

张登海 孟玮 陈宽济 译



● 山东文艺出版社 ●

如何当个好爸爸

[美] 汤姆·布莱顿

张登海 孟 玮 陈宽济 译

山东文艺出版社

1990·济南

如何当个好爸爸

〔美〕汤姆·布莱顿

张登海 孟 玮 陈宽济 译

出版者：山东文艺出版社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发行者：山东文艺出版社发行部

电话 615710

印刷者：济南市建华印刷厂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5印张 102千字

1990年12月第1版 1990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300

ISBN7—5329—0653—1

I·580 定价2.30元

内 容 提 要

本书作者从坚决“辞职”不当爸爸开始，到终于承认“爸爸还得当下去”结束，记述了作者的亲身经历——教育抚养八个孩子的酸甜苦辣。书中从家庭教育的角度生动地论述了家庭是孩子成长的第一课堂这一理论。书中列举大量事例说明儿童启蒙教育的重要性，并涉及到社会、政治、儿童心理、夫妻关系以及法制教育等诸多方面；从妻子分娩前的准备到婴儿出生后的护理，从平时对孩子的关心爱护，父母自身的言传身教乃至处理大家庭各种纠纷，全面阐述了当个好爸爸、好丈夫的必需条件。

本书对孩子进入青春期以后的行为表现、心理变化，诸如早恋、吸毒、对异性的困惑等作了大量的观察和合乎科学的分析。对我国的教育工作者和广大独生子女的父母很有借鉴之益。

目 录

序.....	(1)
我不当爸爸了.....	(6)
大家庭太难管.....	(10)
为何要了八个孩子.....	(15)
孩子即将问世.....	(17)
一场虚惊.....	(20)
我家的动物.....	(25)
孩子们的城堡.....	(33)
成天吵吵嚷嚷.....	(44)
母亲的绝招.....	(49)
清规戒律.....	(57)
小小造反派.....	(62)
新道德的挑战.....	(66)
心爱之物.....	(69)
毛脚女婿.....	(74)
酗酒与吸毒.....	(79)
不穷也不富.....	(87)
“动物”变成了人.....	(95)
伊甸园.....	(102)

这不是我的错.....	(106)
勇于进取的女孩.....	(110)
帮手与佣人.....	(117)
主妇出远门了.....	(126)
上帝，救救我.....	(141)
还得继续当爸爸.....	(146)

序

我的童年是在爱阿华州度过的，那时我立志要当一名走南闯北的列车员。我记得很清楚，因为我七岁时就把这个志向写到日记里了。这本日记我至今仍保存着。

现在，一想到我的孩子们需要停下来思考一会才能说出列车员是干什么的，我就觉得滑稽可笑。但对于列车员的职业就能使一个人“走南闯北”，他们肯定也觉得不可理解。

当我离开爱阿华州时，我放弃了当列车员的念头，转而想当一名记者。后来的事实证明，我可以从事许多种职业——印刷工、士兵、教师、情报员、出版商、专栏作家等等。但是，当我的孩子都长大成人以后我才认识到，每当我填写那些反复出现的、需要说明个人职业的表格时，我并没有完全说实话。

因为，事实上，我几乎用了我的全部时间和精力来当一名父亲，为了教育孩子，我倾注了所有的耐心和钱财，这远比我在表格上填写的那些正式职业所花的耐心和钱财要多得多。我想别人大概也是如此，尽管多数人不象我有八个孩子。

另外，我觉得父亲这个“职业”是没完没了的。回顾过去，我深知，每天二十四小时之内是没完没了的，展望未来

来，我看到一生中都不会有喘息的机会。我过去常想，孩子长到二十一岁，父亲的职责就完成了，但几乎每一位父亲当他的孩子已长到二十一岁时，都会告诉你事实并非如此。孩子的成熟期越来越长，与此同时，法律所规定的成熟期却越来越短。也可能在我的上一代，农村的孩子十八岁就是大男子汉了，但现在，哪一个当父亲的能说自己十八岁的儿子“那孩子已经成熟了”呢？

女孩子成熟得早？可能是吧，但任何一位有个十八岁女儿的父亲必须通过下列测试才能有权说这种话：

上个星期他是否曾经等到深夜，不断地问自己的女儿到底到哪儿去了？

他的夫人最近是否说过她丢了衣服、化妆品或首饰？

是否突然收到一些不大受欢迎的通知单，比如图书馆的罚款单，增加汽车保险费的通知单，百货商店的收费单等等？

除非一位有十八岁女儿的父亲对上述问题的回答都是否定的，否则，他当父亲的职责还没有完成，或者说目前还没有完成。

我的职责也没有完成。虽然我有个儿子已经二十三岁了，但我还有一个才九岁的儿子，所以，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我无法完成我的当父亲的职责。即便我自己认为二十三岁就可以自立了，我仍然需要再拼搏十四年。

在二十三岁和九岁之间，还有好几个中不溜的。让我从年龄最大的孩子开始列个名单，因为他们都是这本书的主角。当你读这本书时，你也许要不时地查找一下这些人都叫什么名字，多大年龄，以便与他们“进入角色”以前的名字

和年龄作一比较。

大卫，二十三岁，长一头红发，膀圆肩宽，手脚麻利。有很长一段时间，我看他好象不大换洗衬衣。我后来想他可能非常讨厌我说他不常换衬衣，也可能就是为此，他最近才去了阿拉斯加，当了一名监狱看守。最近他来信说，他同时也考上了一所大学。这使我们高兴万分，就连对他的印象也改变了。现在我一想到他，就觉得他已经穿上了一件干干净净的衬衣。

玛丽，二十一岁。小时候，她的一只脚有点向里弯曲。医生说应该多揉一揉。所以我用了很长时间向外揉搓那只脚，而每当我揉脚时，我总是以她为题材编一首非常动情、非常温柔的歌曲，就象是对婴儿唱的摇篮曲一样。现在如果我再唱那首歌，她一定会感到不好意思，可如果需要，我还是要唱的。

玛丽现在是大学三年级的学生了。她学习用功，爱动脑筋，长得漂亮，还是个左翼分子。我把那首歌当成我最有威力的武器。如果校园里再闹学潮，如果玛丽觉得她应该在学潮中冲锋陷阵，我就去她的学校，在她正在抗议整个社会制度时走近她身边，唱起那首歌，她的脚马上就会走到正道上 come。

琼妮，二十岁。她有一双快乐明亮的眼睛。因为她比大多数人更注意生活，因此她也更热爱生活。“星期六的早餐”，她前几天给我写信说，“我们做的是‘油炸面包’，满满的一盘子摆在桌子中间，每个座位前还摆了一碗槭树汁。请您闭上眼睛想一想，那有多么香啊！早餐后我在高尔夫球场上练滑雪。不一会儿，天就下起了大雪，所以我就坐

在火炉前，读了几本介绍哈密尔顿^①和伯尔^②的书。我特喜欢过星期六。”

我觉得很少有人能够迅速地观察和思考，但琼妮能做到。

苏珊，十九岁，大学二年级学生。她学习很努力，玩得起劲。她把每个小时都作为必须完成很多事情的界限：早晨六点至七点，是她起床，跑两英里路和吃早饭的时间；七点至八点，学习外语；八点至九点，在校办咖啡馆洗盘子或在家里打扫厨房。其后的每个小时都象这样制定了任务，天天如此。苏珊很少谈论自己的工作，也很少议论别的事情。她长一头金黄色的头发和一双又大又黑的眼睛。她是个很好的运动员，打棒球是用右手击球，但用左手掷球。

南希，十八岁。幼年时期她有一个习惯，给她一穿上衣服，她马上就脱下来，所以得到了一个绰号：“光屁股猴”。现在她已是一位婷婷玉立、惹人喜爱的高个头金发姑娘，我们再也不好意思叫她的绰号了。南希性格欢快活泼，但却过早地谈起恋爱。

伊丽莎白，十五岁。长长的红色披肩发使她显得姿态优雅，但她却高傲得很，总喜欢轻蔑地或者大度地甩一下头。伊丽莎白脸上长了很多雀斑。有好几年，我们都喜欢对着她唱一首名叫“雀斑太多了”的歌。就象南希的绰号一样，这首歌已属于过去的事了，因为现在的伊丽莎白已成为一位漂亮非凡的大姑娘了，脸上的雀斑也已荡然无存。

①加拿大一港口城市。

②加拿大一城市。

托米，十三岁，金黄色的头发，带一口整形牙托。就他的年龄来说，他很聪明，也很讲究穿戴。室内室外，他总戴一顶无法形容的大绒线帽。刚能分辨事物时，他象个数据库，收集着各种精确的信息。他把生活看成是一场个人奋斗。我在一张学校的试卷上看到，他对“证据”这一词的定义得分是“B”，他写道：

“早餐，如果两个人都要了鸡蛋，其中一个人出去了一会儿，当他回来时，他的鸡蛋不见了，而另一个人的腮边沾满了鸡蛋。虽然无法予以证实，但这就是证据。”

尼古拉，九岁，脸上常留下吃过鸡蛋的痕迹，眼睛里常闪动着调皮捣蛋的神色。托米认为他那双眼睛的神色就足以证明他是个调皮鬼。在任何情况下，尼古拉挨的打比我认识的其他孩子都多。尽管如此，他还总是兴高采烈的。我们都愿意和他在一起。

另外还有一个人需要介绍，她的名字叫琼。她是所有这些孩子的母亲。她有能力，精力充沛，可爱，并且长得也很漂亮。

所有这些人，有的住在马里兰州的家里，有的即使住在外而也经常回家。家里有足够的房间，有一个很大的场院，冰箱里有丰盛的食品。

在我的家里，我的朋友和孩子们在一起时相处得很随便。他们与孩子们讨论国家大事，讨论儿童问题。在儿童问题方面，我发现他们一般来说和一名父亲的观点一致。

不管是知名人物，还是平民百姓，我想，凡是到我这套黄色的房屋里来做客的人，没人会不同意我在完成“工作”之余，还应该写一写“如何当个好爸爸”的文章。

我不当爸爸了

回想起我辞去了“父亲”之职的那段时间，我感到非常高兴。我庄严地给这八个孩子留下为他们准备的八张飞机票，然后神情严肃地和他们告别。

那次圣诞节我们去加勒比海的旅行真是糟糕透顶。旅行快结束时，我用了很长时间反复考虑我是否“辞职”，所以，没有吵嚷，没有威胁，也没提任何要求。

但我始终想不起来，在那一个比一个更使人恼怒、更糟糕的事件中，到底是哪一个事件迫使我走了最后的一步。是怎样开始的？是和通常的辞职一样先从怀疑开始的吗？是我听到妻子说“差多差少我都包了”以后疑心越来越重而开始的吗？

琼经常说：“差多差少我都包了”。她是个诚挚而慷慨的人，所以她讲那话也是诚挚的，慷慨大方的。她用自己挣的钱替自己买衣服，并且总留下一些作为慷慨之用。但是，如果真象她所讲的那样都由她来付钱，那么，所需要的费用将超过她私房钱的十倍甚至上百倍。

琼从不担心钱的问题，她对于我不断地精打细算始终觉得是多此一举。经济困难时，当我预测贫困即将到来，或者问她等我们老了靠什么生活时，她总是回答说：“你怎么老得这么快？”

因此，当全家人都想买点东西或想干点事情时，只有我说“我们没那么多的钱”，而琼总是说“差不多差少我都包了”。通常，我都是以适当的口气予以反驳，但也有些时候，就象这次圣诞节旅游，我发了善心。

为了决定是否在圣诞节带这八个孩子去加勒比海旅游，我们争论了很长时间。琼认为呆在家里，给每个孩子送一件圣诞礼物，花的钱不少于全家去加勒比海旅游。而孩子们也会理解，这次旅游就是送给他们的礼物，别的东西不再买，也不再邀请客人了。

为了支持她的地位，使她获得优势和权威性，在一次鸡尾酒加薄脆饼的晚会上，她请教了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亚瑟·伯恩斯先生。因为琼和亚瑟·伯恩斯先生是好朋友，而且亚瑟·伯恩斯先生本人也是一位友善和蔼的人，他也许会同意让琼来决定。

我不顾伯恩斯先生的相反意见，试图用算术方式来争辩。“十张机票，每张一百五十美元，一共是一千五百美元，另外还要加上约五百美元的旅馆费。我们买圣诞礼物什么时候花过两千美元？”

“差不多一千美元，”她承认说，“但你没有算上装饰圣诞树，请客人聚餐以及请帮手的费用。不管怎么说，反正差不多差少我都包了。”

我有一种预感，不光钱数会差得很多，而且琼也没有能力来承包。这可能就是引起我“辞职”的第一个原因，是由于愤怒、软弱和无能等因素混合在一起形成的。

也许是因为泛美航空公司阻止了我们旅游？“我无法让你们全上飞机。”飞机起飞前，我把十张机票递过去，服务

台后面那个人这样对我说。我的脸立刻沉了下来。“你说什么？”“是这样，先生，我们还剩七个座位，但也许我还能再挤出一个座位来，”他认真地说。“请稍候，我查一查。”然后他俯身于一张大图表前。“吉姆，您说的是230还是231？”

我的大脑掠过早晨的情形：五点半起床，以妈妈的名字而取名的琼妮将一杯咖啡端给还躺在床上的我那位夫人；我叫了两辆出租车，装上了十四个包；这些由特殊的纸做成的、肯定是空投专用的纸包里总是装满了口香糖和玩具，而且不管走到什么地方，这些纸包总是摆在前门厅里；装车时还是把纸包撕破了；又返回家中，因为我那六岁的孩子尼古拉要上厕所；好容易赶到机场，付了小费，再把十四个包卸了下来。

而现在，那个人说什么“我无法让你们全上飞机”。我好像遭到了雷击，眼前浮现出我的朋友，在《新闻周报》当专栏作者的斯图尔特·阿尔索普常用的“涨红脸”的战术。面对那些为公众服务但其行为却十分恶劣的人，阿尔索普将深深地吸气，直到肺部涨满为止，然后他用力憋住气，双脚一跳，占据一个有利位置，脸涨得通红，眼珠象要突出来似的。把他预定的房间卖出去的服务员或者让他放弃飞机座席的票务员，通常会以为他要打架，往往做出些让步。我也想来一次“涨红脸”。

琼在我之前使用了示威的战术。她首先尖叫起来，然后就哭，可一点作用也没起。站在服务台后面那个人显得受了委曲，但却很耐心。这种耐心对航空公司的雇员来说是必须具备的，因为有些航空公司经常多卖机票，而除了圣诞节前后

以外，缺座的现象很少发生。“要这七个座位吧，布莱顿先生，要不我就给那些等票的人啦。”

我身后的人都伸长脖子向前涌，每双眼睛都在寻求着机会，看我是否由于提供的座席少于我应该得到的数量而放弃了这次机会。琼还在哭。她抽抽噎噎地说：“两个月前我就预定了机票，昨天又确认了一次。”只好如此了。我很快地按年龄将孩子们分开，各人带各人的行李，让七个人——琼和六个最年青的——乘机先走，我和两个年龄最大的孩子明天再走。

这太气人了，太卑鄙了，太不公平了，既给我们带来了麻烦，又破坏了我们全家的欢乐和骄傲。也许是命该如此吧，但这证明我同意这次不必要的、昂贵的并且使人疲劳的旅行是非常愚蠢的。可这还没到“辞职”的程度。我还没有丧失信心。我在机场等了一天，又等了大半夜，心里还尽量想高兴起来，我压根儿没想到要大发雷霆。

事实上，一直到圣诞节结束我们开始回家时，我才真地想发火了。那天，我们又来到机场，我又检查了一遍十四个包，又递过去十张机票。检票员说：“赶快上飞机吧，布莱顿先生。”我回头一看，有五个孩子不见踪影了。

我真有点气急败坏。没有时间耽搁了。“他们和南希一起去了餐馆，”一位“忠臣”主动告诉我。我飞快地在桌子和椅子中间寻找，抓住了南希——南希已经十六岁，留着金黄色的长发，穿着蓝色工装裤；我又飞快地将她那几个开小差的同伙拽到飞机上。正在吃早餐的人都抬起头来看我们。

“当时很不自在，”南希后来说。我想也是如此，但我当时觉得她的辩解实在令人气愤。“不管怎么说，”当她找到了座位，引擎刚开始发动时，她对她妈妈讲，“我花的是我自

己的钱。”

其他的孩子都站在她一边，而琼却说双方都有理。双方都对？！也许就是在这个时候我下了决心。如果说我对南希“花自己的钱”或对我夫人“双方都有理”的说法恼怒万分，那么，最后的一击，也就是把我逼到墙角的那件事，就是他们对我的评论。

凌晨两点，我站在肯尼迪国际机场附近一家旅馆八楼的电梯间门外。我亲眼看着十四个包从皮带传送机上卸下来，并帮着把包装进汽车，然后将包提到大厅里。现在，这些包全摆在我的面前。我脑子里正盘算着如何把这些包和十个人分配到三个双人房间里去，其中的两个房间里还有帆布吊床。“爸爸”，我的女儿玛丽以那种只有大学三年级的学生才有的趾高气扬的口吻说，“你就象一个小排长似地指手划脚。你不认为把我们都当成军队里的士兵来指挥有点过时了吗？”她皱着眉，噘着嘴，说出了这句话。

时候到了。肯定就是在这个时候。“能有什么办法？”我自言自语地说。“你能有什么办法把十个人带到加勒比海再带回来？你能有什么办法处理他们的行李，订购他们的机票，寄出他们的护照，支付他们的人头税，把他们从餐馆里拉出来拖到飞机里？除了当一名小排长，还能有什么办法？我曾当过排长，可我在职期间从没受过这样的窝囊气。”

大约在那天上午九点，我“辞职”不当爸爸了。

大家庭太难管

也许我不应该要这八个孩子。回想起来似乎有些奇怪。

仅仅在十年前，人们还愿意有个大家庭。我的母亲有姊妹七个，我的父亲是兄弟十三人中最小的一个，而现在，根据人口调查局的统计数字，美国每户家庭平均只有2.2个孩子。多子多福不光已不再时兴，而且人们认为那是对生态平衡的一种破坏。我了解这种说法，也赞同这种说法。我清楚地记得第一次认真考虑这个问题时，就曾觉得八个孩子即便不算多，但至少也足够了。

我在加利福尼亚的欧申赛德办了一家报馆。一天，我们躺在床上，琼正在给我们的第八个孩子喂奶。我们先有了一个男孩，然后接二连三地生了五个“千金”。尽管我绝不承认对性别有什么偏见，但第五个女孩子伊丽莎白的降生在当时确实显得多余了。

奇怪的事情发生了。伊丽莎白不久长出了一头红发，使她与众不同。后来托米出生了，而后尼古拉又来到了人间。斯托布·哈威是我的高尔夫球和橄榄球的球友，也是我的家庭医生，他宣布：“从现在开始您便会有男孩子了。”

我们有一天还躺在床上时，一个孩子拿着一封电报来到床边。琼打开一看，随即大笑起来。“妙极了。”她说着便把电报递给我。电报是发给我的。当时只是出于对一个怀抱新生儿的母亲的忍让，我才没有发火。

这封电报是由美国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签发的。上面写着：“恭喜。我认输。”

我感到高兴和自豪。肯尼迪有几个孩子？七个？突然，一种不祥之兆袭上心头。肯尼迪有多少钱？我在某个资料上看到，司法部长兄弟姐妹们每人都超过百万富翁好几倍。虽然我比肯尼迪孩子多，可我有什么资格接受人家的祝贺？就